

专访好青年茶毒室：沉默的一年，哲学还有甚么用？

“留下来的人可以做什么？重塑香港人对人生的看法。”



好青年茶毒室创室成员甘仔与四哥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梁越 (+)

端传媒记者 梁越 发自新加坡 | 2022-02-09

好青年荼毒室之名，来自苏格拉底。苏格拉底喋喋不休，毒酒都不能阻止他做后世的牛虻。这次访问，却从噤声开始。

“无力感真的是前所未有的。”提到2021年，成员四哥一口气说了许多。数分钟以后，他才想起，背后原因都不可说。身旁的另一成员甘仔也点了点头：“有时有点潜底（怯懦），是‘噗’一声有这种感觉，但你说是否很强烈，又不是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有时你会想退。行两步，退一步。”

好青年荼毒室 - 哲学部一向不是如此。这个由13名中文大学哲学系研究毕业生成立、于2016年诞生至今的香港哲普团体，自去年中有份主持的香港电台学术清谈节目《五夜讲场》被腰斩后，年底众筹港币60万元，以原班人马开拍《哲学系咁倾》。意外地，众筹于不足12小时之内达标。

“系咁倾”，即不断倾下去的意思，与荼毒室形象相符。包括四哥和甘仔，成员最大特点，正是喋喋不休。逢星期五在YouTube直播，在逾千观众面前天南地北，题材由韦伯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》、傅柯《规训与惩罚》，到“入新亚，中大四院我称霸！”的Dem beat，动辄聊上4、5小时，众人争相说话，“俾我讲埋先（让我先说完）”成了口头禅。

唯有提到移民、别离等话题，方见静寂。



生离死别、家破人亡 “现在的无力感是家破人亡。”甘仔说。

甘仔、四哥和茶毒室的创室成员，毕业于中大哲学系，部分人曾为多间院校的客席讲师。他们创立茶毒室的原因，正是希望哲学可以脱离学术的框框，成为日常大小事的思考态度。对甘仔来说，2021年的代名词，是无力，且是生离死别的无力。

因为疫情，去年初即使甘仔的家人病重，他都不能探访。“一个人生命走到尽头时，正常都会想有人探访……但我们连玻璃房（隔离病房）都不能进去。到最后可以见到她时，她已走了。”

死亡不是唯一的离别。身处低沉的社会氛围，甘仔朋友圈子的人走了一半，当中有认识20多年的好友。出走之急，他们连工作都未找到，已先行远去。“我们建立出来的social bonding（社会连结），基本上瓦解中。对我来说，无力感来自于孤独的感觉。”甘仔说。

留下的人孤单，离去的人亦如是。甘仔记得，好些远去的友人，在他乡亦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族群，“他心灵是不想走的，肉身却走了，同时又想回来。”没有工作，自然没有同事；又因缺乏安全感，没有接触当地的香港人；每天在家无所事事，只能不时致电回港，但又陷入失语：“他一直想找回在香港的bonding，但已经……例如，我跟他讲香港多了很多日本店舖卖和牛，以前没有的。他说，‘噢，原来香港变了很多’，然后已经不能接话了。”

也有一说，在外地重建香港好了。但甘仔觉得，香港人惯于入乡随俗，又是矛盾：“你去到别人的环境，就要入乡随俗，讲英文，日文，whatever。那么你的下一代是说英文还是广东话？如果你最初是想保留自己应该有的东西，不是应该说广东话吗？但这又和入乡随俗的原则相违背。你再问清楚一点，你会发现原来全部人，包括我自己都没有想法，想不到。这是一个很痛苦的dilemma。”

四哥认为，留下来的人亦面对两难。现在留下，不等于以后不会离开。他忆起，有天偶遇老同学，记忆中的他，不爱束缚，故一直为自由工作者。岂料他向四哥说，最近进了大公司工作：“‘哦，若我以后移民，我拿这个在大公司的portfolio，移民后会容易一点找工作。’他没有很肯定要走，但他都要做好准备。”

即使在香港的履历表有多亮眼，移居他国后谁都不肯定能否做回老本行。“有不少室友上来签书，说下星期就走。有室友说去到当地，就不再做本来的专业，会转做餐饮，其实工资差不多（笑）。”





四哥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但四哥笑不出。他从来认为，事业可以是人生的核心，“对于一个不可以延续他本身职业的人来说，我觉得是生命上的挫折。”

甘仔坦言，最初有点责怪移民的人。“我最初想，不如有屎一齐食啦（一起吃屎），会否没有这么孤独呢？”但随时间过去，他逐渐理解，亦只能理解——没有人想离开，但他们确实不能留下来。“我们的感觉，不论是否政治也好，疫情亦都有关，共同体最基本的感觉是痛。没有了social bonding的那种痛感，是一种香港人才感受到的痛。”

甘仔举例，有时玩语言交换app，跟外国人聊天，最有感受。“和一些日本姐姐、台湾姐姐聊，她们会问你香港是怎样的。问多两句，你会发现她们感觉不到你那种痛。她们会不断追问香港的情况，我就觉得妳不如不要问下去，我觉得很难受。我再看下去，会受不住。”但另一边的她们却又继续发相关的香港新闻过来，“她们会问你是否怕、不用这么怕。原来她们不明白。”

他又想起，读硕士时曾到丹麦交流：“（丹麦人）他们的facial expression太过开心，我会觉得，你咁开心做乜x野（你干么这样开心）。我很不开心，你会觉得香港人都在背负一些很重的东西离开，留学又好，移民又好，大家都有一种郁结的感觉。不用说2019年，2016年之后都有啦，2014年之后都是。”那几年，香港正正经历了几场大型的社会运动。

纵再无力，有些人都不能离开，包括四哥。“过去10年已经有人说，越来越理想化，一种世界公民，古希腊都有这个字，一个无根的人。我做不到的，是无根。”他想像如去到外国，虽可以认识新朋友，但找不回出生地、原居地的文化土壤。“例如我刚刚认识你，我可以跟你说一个周星驰的梗，你会立刻笑，大家可以说旺角哪一间店好食，我们的connection有一个很厚的文化在里面。”两人不断以香港形容食物的术语以及共同回忆举例，萝卜有渣、西瓜有沙、天水围聚脚点“大7”、电影剧情徐锦江个x样……一旦到了外地，上述的意义将会失去。

“Community背后有一个深厚的文化历史基础，而我们的交往，我们的沟通，我们的情感建立，就在这里拿一些资源来建构。移民，这些就全没有了。”四哥道。



甘仔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意外建构的Community

茶毒室最初没有想过，要为香港建构一个怎样的Community。甘仔说，茶毒室中人多都是率性为之，做事不一定有详尽计划。决意创室那天，不过是中文大学哲学系中人一场日常酒吧聚会的酣后建议；由定期撰写

哲普文章，到定期于Youtube直播，亦不过是将平时的饮酒吹水（聊天），搬到镜头之前。

至于新活动，据甘仔所说，一般都是将就促成：“有些人说不如拍点东西，又会有人说好呀好呀。喂开拍啦，你班x样（混蛋）是否出现呀，食屎啦，又无人应机（回应）。通常猪文（另一位茶毒室成员）是这样叫人回来做……我们没有计划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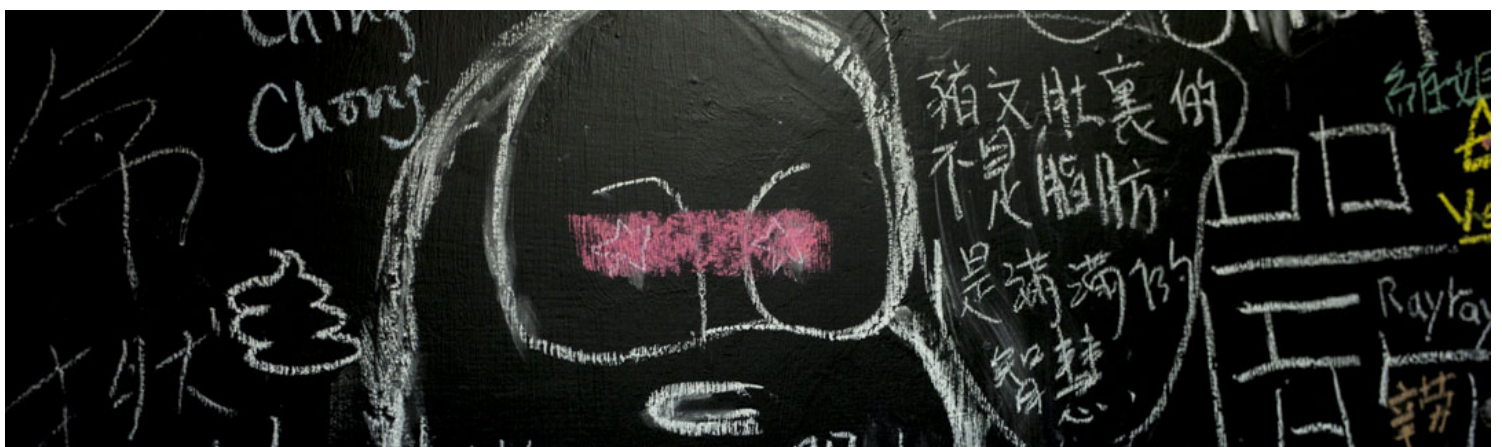
茶毒室的五周年生日派对，雏形也不过是找一张乒乓球桌，“大家打乒乓球就算了……之后有些人建议不如拿些木头回来，做摊位游戏，好呀。其实真的不是很认真。”讨论之后，派对扩展为有多个活动的嘉年华。甘仔记得，派对前夕的晚上11时，活动布置完成度不过30%；到派对开始，主要场地活动如常，楼下的停车场则有10多人仍在尽最后努力，继续布置工作。

虽非有意为之，在这充斥无力感的2021年，茶毒室却碰撞出许多新的尝试。在成功众筹开拍新节目之前，他们推出了网上教学平台“好青年精神时光屋”，联同一众学者讲授哲学或人文学科课程；在Youtube拍摄饶有深意的短剧、接拍广告；与香港新崛起的流行文化力量如唱作歌手Serrini、Youtube频道“试当真”合作；又推广大型文化活动如法国五月艺术节、PMQ的 deTour 设计节、香港亚洲电影节等。

相比多样的尝试，更重要的是，茶毒室这样理性中带着率性的存在，凑巧填补了许多留下来的人内心的空洞：“例如有个姐姐说，她自己一个人住，五周年（聚会）时找我们签名。她说自己一个人住了很久，当她觉得很孤独时，就会开我们的podcast、live，纯粹是有点人气。”甘仔道。

为了不再孤独，也为了寻真。香港日常的新闻、电视台的戏剧，四哥认为，总有一种虚伪，“就像平行时空，很荒谬。”而茶毒室的直播，成员们偶而东拉西扯，有时认真讨论哲学，边说边举杯，醉后有狂怒也有流泪，呈现真实的性情。不少室友曾和二人分享，茶毒室填补了他们的心灵空虚，也找到了共鸣。

久而久之，被称作室友的观众们，聚集于茶毒室专属的网络通话软体Discord群组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social bonding。“我从来都期望，茶毒室不是我们这10几人，而是community。他们自己会约出去画画，唱歌，这就是正在打造一个community。”四哥说。





好青年茶毒室内的一幅写满字的黑板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这个群体的意义，突破了单纯的围炉取暖。打开群组，除了闲聊，竟有并非哲学专业的室友就各类议题，例如音乐、建筑等交流，更会为此制作简报，甚至以论文分享心得。“好癫，大学都做不到啦，你一进去，有一班人在简报。”甘仔道。

近年，该群体进行的活动更逐渐脱离茶毒室这个主轴，室友在交流之中互相启发，按自身的兴趣进行多样的创作，由画作、烹饪到音乐MV，数量之多，足以供茶毒室于五周年活动举办室友作品展。“这样最好，不用跟着我们，有自己的独立发展。”四哥说。

更重要的是，因为茶毒室，他们看见了彼此。哲学并非流行话题，这年代有话亦不一定能尽说，好哲学爱好者，从来难寻同道。而茶毒室的存在，正提供了连结的平台。四哥记得，五周年那天，一对姊弟在此相遇，方知对方都是室友。“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在香港，可能有些人对哲学有兴趣，但他身边凑巧没有这些人，我们帮他们拉了红线，找到一堆人可以和他讨论这些事，这种讨论的学术气氛，都可以在这里流传下去。”

开拍《哲学系咁倾》亦是为了保留讨论的氛围。甘仔表示，华人社会并非没有讨论哲学的节目，却多是单向的讨论，“一个speaker，在教书。One-way的很多，multi-way的很少……台湾台视也有哲学节目，通常都是一个学者去讲，而不是讨论。”

回归初衷，由港台的《哲学有偈倾》，到今时的《哲学系咁倾》，都是难得的双向形式哲普，“最重要是展示一种讨论的态度。”甘仔道。

砍掉重练

讨论的空间，在这时代尤其可贵。人群离散，一众“北望神州”的政客及艺人又止抢夺“说好香港故事”的话语权。有媒体报导，香港电台将禁播某些歌手的歌曲，如黄耀明、何韵诗、RubberBand等。甘仔觉得，整个香港的文化土壤，正面临崩坏：“不是没有connection，而是这个background开始没有了。”

由香港男子组合MIRROR的红极一时，“试当真”的崛起，再到荼毒室的多方合作，反映不同的新土壤正酝酿发酵。至少，有人在做香港人本土创作。然而，在甘仔眼中，与其说是发展新土壤，不如说是一种被逼的自救。

“现时的香港，好大部分的人都正在面对一个Existential crisis（存在危机）。”

以往的香港，是各得其所。政治有其固有的抗争之路，文化有既定的渠道，普通人亦有寻常的道路，“以前他们会觉得，打好份工就可以，结婚就一定是这样、婚宴播放的成长片段也一定是这样。”现在，固有的理所当然逐一倒塌，平常的生活亦随时被打乱，危机随之出现，“我们刹停了人生本来的planning.....就像现象学，还原、悬搁本身的自己，是一个契机重新检视，这个世界似乎有其他事物可以看。Existential crisis间接促成了他们思考人生有没有其他可能性。”

个人开始重新检视自身，亦开始检视社会。“香港人以前有种不需要自救的骄傲，喂我一出生，香港就是东方之珠、国际大都会、亚洲金融中心，纽约、伦敦之后就是香港。喂这些东西是别人给你的，金融体系是别人想出来给你的，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。”





好青年茶毒室创室成员甘仔与四哥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也许是前殖民地的关系，香港惯于一切皆为外来，日子久了，竟也内化成自身的基石。80、90年代，多少当红歌曲是来自日本的作品，又有多少童年回忆是日本的动画。那个香港的黄金年代，其文化体系近半来自日本，亦延续至今：“香港人很喜欢日本，我觉得这亦是一种找救生艇的心态。没有了中国的文化基础，就寻找另一个归属感。韩国（当时）太细，台湾又不行，那就找日本吧。”

甘仔认为，当一切都被暴露，香港人终于被逼醒觉，“当弱者认识到自己是弱者时，就会有创造力。何来创造力，就是做一些你本份可以做到的事，而不是站在一个虚假的位置。”

“其实四个字就讲完，砍掉重练。”甘仔道。

然而，创造不能凭空，更何况摆脱几十年假象之后的空虚，人们都需要支柱。去年经历了生离死别的甘仔，有如生活于迷雾之中，想找一个方法安身立命，“我发现哲学真的有点用。”孔孟令他知道义命分立，只需以义安命；实在论令他知道现实从来独立于理解，又岂能预知现实没有可能改变？

甘仔如此，室友亦如是。好青年茶毒室12小时之内众筹到60万元港币开拍《哲学系咁倾》，甘仔觉得，这有点像教会的奉献，哲学成为理性的圣堂。不论是日常相处，抑或五周年聚会当天，室友都会向成员们倾诉所想：“很多室友面对面聊天的感觉，他们好像当了我们是牧师……大家需要在生命中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。他们会觉得在一个混乱的地方，找到一个心灵的空间，而且是公共的。先不说这是否等于反抗，但是一个信念的一种捐赠。”

“哲学从来都是一个需求。如果你不想用宗教方式令你安身立命，你就会用理性方法。”甘仔道。四哥说，最初港台监制提出《五夜讲场》的概念，每集由多名讲者探讨哲学、科学等严肃议题时，曾被高层拨冷水。谁料节目播出后，收视不俗，“他们原来看轻了香港人，香港人都可以有这种需求……一直以来都有这个需求，只是人们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需求。”





好青年茶毒室的出版物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留下来的人，请艺术地活着

近年，四哥经常被室友称为四猫。他从未想过，不过是于一次直播中扮猫，他的形象定义，说变说变，成为了他和群体的共同语言。

四哥总爱说，茶毒室与哲学为他开启了人生更多面向，亦认为可以为他人开启更多的面向。“我从来都不会说什么末世”，四哥道，“留下来的人可以做什么呢？重塑香港人对人生的看法。”

室友到茶毒室位于湾仔富德楼的会址买书，当中有中学女生提到大学选科的选择，“哗，原本想读law做律师，她见到现在，法律还有用吗？不读了，和家人吵架，要读哲学。”四哥觉得，这跟读法律或哲学与否无关。他知道，现时的环境下，大家都很难开心，但留下来的人，可以利用哲学思考去撼动大家的人生价值。“以往阿叻（陈百祥）那一代的看法是，最紧要开心，其实是一种naive的快乐主义。除了开心之外，人生还有没有其他价值，值得我们去追求呢？”

有的。“就是做人，要型。用一套美感的词汇、艺术的词汇去评价人。不要用那个人在社会成不成功、搵几多钱、有几多follower，不要用这些去评价。我们用柒和型来评价。”四哥认为，这年茶毒室的各种尝试，正是展示了上述可能：“茶毒室其中一个正（好）的地方，是我们自己可以demonstrate自己给别人看，做人，可以有很多variety。”

存在先于本质，本质来自定义。赋予了意义，痛苦也变得可以忍受，“原本只是理论，是尼采的想法，我觉得可以apply在现在……有了这些价值观，我们挨得过。有了这个，香港文化才可以延续。”四哥说。

四哥并非一口咬定，上述理论必然正确。哲学本来是无尽的质疑与自问，茶毒员成员们亦曾质疑，哲学真的能普及吗？在这世代，哲学还有意义吗？

现实是，红线下有些事不可说，就是不可说。“你会开始避题材，就会发现冇乜货（没有什么可说了）。哲学，无论你说怎样说，都会有少少……但你会发现，你原来想说的会支离破碎。”

同样是红线之下，香港文化创意却同时怒放，甘仔认为，这不过是萌芽阶段，至少，主流的美学仍未能摆脱外来的基准：“一个完整的族群身份，会有一个精致一点的流行文化，有自己生产出来的product，有自己的design，有种独特的审美观念。”MIRROR是类似韩风的组合，香港依然充斥以日本为准的审美。

即使是本土地下乐队，或是“试当真”、茶毒室等以香港人为目标群众的团体，甘仔表示，他们暂时仍未谈得上是香港主流。“（上述创作团体就如）铁达尼号沉船时，会有一块木，但它暂时不是救生艇……除了软实力，香港硬的工业呢？要整套都有，才是真正的救生艇。”



好青年茶毒室创室成员甘仔与四哥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甚至，作为哲普团体成员，甘仔心底里不想哲学思考成主流。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以后的黑暗时代，人们执着于寻求上帝作为寄托，芸芸众生都追求哲学，这个世也必然是黑暗时代。“哲学要求的那种很木直的反

有了对尔上中作之可见，有说七八人都想尔白于，这地区也当然是黑暗时代。白于尔的那四五个兵的反省，只是一个很短暂、critical的moment。如果这种思考态度成为主流，那么我们是好悲惨。”

矛盾在于，正是黑暗年代，哲学作为安命之用，更显其价值。“我有些朋友做大陆生意，无啦，封关。以前觉得自己搵钱至大至上至叻，现在没有了，他可以去哪里呢？完全就是迷失，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，即使他有钱也好。”甘仔说，“当你做一个comparison，就会见到哲学其实是有用的。每一个人都需要抛锚，知道自己的xy（座标轴）位置，好多人连世界地图都没有。”

被逼觉醒，原来自己什么都没有，也好。抛开过去的假象，通过哲学，至少做到直面真实。“从来都以为自己是巨人，但你可以做的只是取巧。这种找回自己的Self knowledge，在这一刻是最有效的。”甘仔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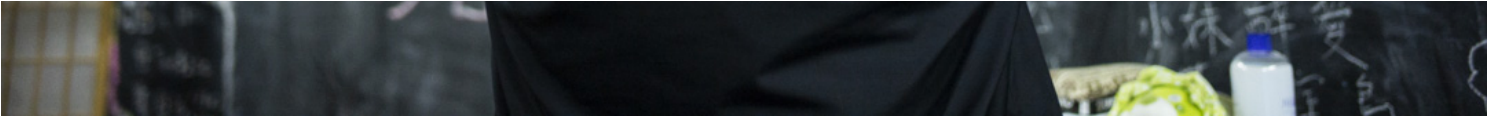
了解自我以后，方可创造自我。四哥觉得，这才是哲学给我最有价值的一课：“自由是离开自己，审视自己，从而令自己可以塑造自己。这个是最重要的，不是什么理论。”

1月31日，筹备多时的《哲学系咁倾》第一集首播。这集的主题，是意义的追寻。

其中一种意义，可以是美学。“如尼采当时问的问题，若人生痛苦，如何值得活下去？答案就是，人就是艺术品，我们作为美感活着，为了美感而存在，就有意义。”

“做个更好的自己。改变到自己，你咪型嘍，你有格嘍。已经好值得了。”四哥道。





好青年茶毒室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